

观沧海 编

「末代大学生的」

最后日子

山东文艺出版社

「老五届」

三十年

风云录

“老五届” · 三 · 十 · 年 · 风 · 云 · 录

「末代大学生」
的最后日子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观沧海编.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观沧海编)

ISBN 7-5329-1730-4

I. 末… II. 观…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049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199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丛书，是本社为“老五届”人讲述自己大学毕业后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所提供的讲台，因而作者全为“老五届”中人，所述主要是离校后的情况；文体以回忆录、散文为主，兼用其它纪实性文体，不取小说、诗词等创作成分重的文章。文责自负。编排上，因同是“老五届”中人，不论身份地位高低，所以除选取个别内容厚重、写作优秀的文章排在首位外，余者一律按作者年龄为序。文后所附作者简历，只注出汉族以外的民族；毕业学校均用当年名称，毕业时间则为应毕业的时间；作者的社会职衔，未注明的不强求写，已注明的则只取全国以上的写（文中已写明的亦不再注出），以简为要。

为使更多的“老五届”人参与其事，每本书后均附有征稿函。只要客观允许，本丛书将陆续出下去。此外，本书还设有“寻呼台”，为“老五届”人寻找失散了的“老五届”学友提供服务。

1993-12

作者与读者

（代前言）

这套丛书的作者是“老五届”大学生。

“老五届”，这个不甚规范的称呼，在 80 年代落实有关政策时，曾时有提过，如今，连身为“老五届”中人也淡忘了。其实，所谓“老五届”，就是指“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1966—1970）大学生。当年，也曾有人戏称这批人为“末代大学生”。

突如其来的“文革”，搅乱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离开学校时，多数人被送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少数人直接到了与本专业无甚干系的最基层，所谓学冶金的去打铁，学石油的去卖油，在当时都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他们身同“老三届”（“知青”）的弟弟妹妹们一样战天斗地，艰辛备尝，头上还多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以至于走出“广阔天地”后，也难能用上所学之长。国家大乱之时，这批人的命运，犹如断线风筝，随风飘荡难自主。但

是，无论飘落何方，他们总能在栖身的一角，默默地尽心尽力地去做那份无论离所学专业远近的工作。到国家由乱而治的年代，他们已经成熟了，先是陆续回归专业本口，逐渐成为业务骨干（也有人在与所学完全不相干的工作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头学起，已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骨干）；继而又有很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挑起了社会赋予的重担。他们已成为当今社会无可否认的中坚力量。

这批人，命中注定要与共和国同命运——共和国诞生之际，正是他们接受教育之始。共和国“文革”前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点滴不漏地渗入到他们的学业中、灵魂里，铸成他们可悲可喜、可感可叹的特性。其中最本质的是他们的忠诚、律己、踏实、负责。凭此特性，国家大乱之时，他们道路坎坷却没有沉沦；国家大治之时，他们手握各种权力也多能奉公守法。离开学校后的三十年风云变幻，他们已稳稳接下了父兄的重担；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初，他们又将陆续退出社会舞台。当此之际，这批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没有话要讲吗？有话讲，有很多话要讲，这便讲出了这套丛书。

讲什么？不是诉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吃苦是平常事。文弱书生下基层，干活累，吃住难，他们讲来竟很平淡，因为比起他们亲身感受到的基层群众长年累月的困苦、艰辛，他们并不以为自己有多苦；何况，他们也不怕苦，视筋骨皮肉的劳累为人生的磨炼，而那磨炼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比起当时前途更加茫然的“知青”弟妹们，他们有一份工资和不论好歹的工作，似乎应知足；但只因比“知青”们高了几年学历，也就比“知青”们多了几层“臭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讲起来反倒更沉重。不过，这与其说

是诉苦,不如说是反思,因为那种把文化、知识踩在脚下的痛苦,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到文化、知识重受社会推崇的时候,他们当年被迫中断了的学业,被迫改换了的,都成了他们评职称的障碍,而更重要的是成了他们渴望报效祖国却自感知识不够的深层痛苦。此时,他们大都过了不惑之年,仍需奋起直追,甚至同子侄辈一起重进课堂,重进考场。对此,他们讲得苦涩,也讲得自豪,因为他们并没有认输,没有自暴自弃。他们的自强不息,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但他们也不是为炫耀,只为这段人生没有虚度,这段人生应当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无声无息地工作,鲜为人所知。其实,他们之中并不缺乏地位显赫、声名显赫、成就显赫的人,他们不平凡的业绩,是拼搏出来的,理当为世人所知;而更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他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凭的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凭的是自尊自强的人格。他们以平常之心,讲述自己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不以文学风采取胜,更无哗众取宠之意,只以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情,为社会留下真实的记录。

这套丛书的读者,也是“老五届”大学生。当然,也还有其他人。

“老五届”的人,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背景,大体相似的经历,大体相似的心路历程,即使无暇自己讲自己,也定然想看别人如何讲他自己,如何讲那段大家都曾有过的岁月。或者,人过半百,更易怀旧吧。只是温故而知新,怀旧也并不都是感叹,对人生总是有益的。因而,这套丛书,首先是“老五届”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

其次,这也是一套写给“老五届”子女看的书。“老五届”人的子女,如今大都长到当年父母身为大学生的那般年纪了,风华正茂,置身于与父母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并不了解自己父母的过去。但是,就像“老五届”人当年也想了解他们从旧社会走过、从枪林弹雨中奋斗过的父辈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渴望知道他们走过的道路。这套“老五届”人亲手所写的书,没有说教,平易近人,“宛如平常一段歌”,会让他们的子女和子女辈的新一代大学生们,感到亲切可信,生动有趣,有益于沟通两代人的感情。

再次,文化学者、历史学者等社会学研究者,也会读这套书。因为这个群体同“知青”一样值得社会注意。这个群体所受的教育,是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十七年教育史,有许多利弊得失值得研究;这个群体的成长,是共和国由乱而治而改革开放的成长史,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研究这个群体,对于共和国的历史及其未来,都有它的实际意义。这套书,饱蘸“老五届”人的心血,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败得失,是难得搜集的社会研究资料,肯定会对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有助益的。

最后,与“老五届”人属同时代的人,尽管没有“老五届”的大学生身份,却也同时感受到那段历史的酸甜苦辣,想来也愿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读一读这套书的。即使当代人,难道就不想了解逝去并不远的这段岁月吗?这样说来,这套丛书的读者或许不会太少。

“老五届”人约有百万之众。如果人人动手写自己的故事,人人翻看别人写的故事,那么,这套书会经久不衰的。

观沧海

1999年3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作者与读者(代前言) 观沧海(1)

下落 肖 陈(1)

夙愿 鄂·苏日台(17)

于平凡之处见真情

——忆军农战友吴亦侠 周其华(27)

啼笑皆非的回忆 赵 捷(41)

我的钻工生涯 李同旭(58)

那段生活怪有趣 王树国(64)

思潮滚滚忆当年 赵尚基(74)

昌江回忆二题	寓 真(85)
由一次笔误所带来的	李法文(97)
律师要仗人间义	王尚文(112)
生命的火花	张书元(127)
匹马单枪的日子里	尹永忠(136)
打工记	于 任(146)
戍边拾零	郑继有(155)
“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孙永猛(174)
随风摇曳的幌	郭俊峰(202)
六盘山下风雨路	柳 富(214)
往日情怀 如诗如梦	廉正祥(235)
凝结真情的《通讯录》	马恒祥(247)
七宝山下觅旧踪	吴秀琴(257)
平平常常才是真	胥正范(272)
依然年轻	黄元森(279)

附：

寻呼台	(288)
征稿函	(290)

下 潜

陈 勇

1985年前后，我写过一部自传体纪实小说《喀什——1968》，它真实地记载了一对新婚的大学毕业生——我和妻子小惠共同走向社会生活最初的一段人生旅程。小说发表后不久，即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有报刊评论说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这个评价过分了！但是我相信一些青年朋友说的：他们读这篇东西的时候很感动。因为那是作者真正掏出了自己的心，真诚地奉献在读者面前。他们期待着它的续篇，可是这续篇一搁就是十多年。不是不想写，而是于世俗的庸碌之中，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心绪和感觉。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就像递过来一把开启回忆之门的钥匙，离开喀什之后的许多往事正

从历史的风尘中浮现出来……

在喀什逗留的二十多天,是我和小惠同命运抗争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由于我们据理力争,才避免了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异乡又面临夫妻分处两地的命运,我们总算被一起分配到了莎车县。一辆路过莎车去叶城的卡车,在蒙蒙的晨雾中载着我们离开了古城喀什。已经是初冬季节了,我靠在车厢板上,仰脸向上,看到公路两旁树木苍劲而光秃的枝桠纷纷向后移去,它们像两排松散的连绵不断的仪仗队,不时伸头探脑地向车厢里张望,仿佛它们等了很久,等来的却不是它们要欢迎的人。一群寒鸦聒噪着,鼓动羽翼跟着汽车在我的头顶盘旋相随,好像暗喻着什么不祥,久久地不肯离去。那一幅枯树昏鸦和灰暗天空组成的出塞图,便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车终于停下来了。“这就是你们要去的莎车!”司机漠然地对我们说,“下吧……”就像卸了一袋货物,把我们连行李带人留在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两个茫然无措的年轻人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央,举目四顾:土路、土屋、土人,甚至连路边的树叶都积满了厚厚的尘土,这就是莎车,就是我们要永远生活的地方吗?我们将会在这里遭遇些什么呢?我心里不由一阵惶惑,又一阵凄凉……

行李拿不动,我一路打听去县“革委会”找人。小惠留在原地守行李,就见忽地拥上来三四个衣衫褴褛、乞丐样的维族老乡,他们伊伊哇哇,连说带比划,不管小惠听懂没有,将地上的几件行李扛了就走。这是几个想挣钱的脚夫,他们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刚刚分配来的学生。小惠连呼带叫在后面紧追,跑得气喘嘘嘘,正好被我推车迎面碰到,直到那些人拿了我付给的钱,欢

天喜地地走了，她才晓得是一场虚惊。

那时候，莎车县“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原先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的县武装部一名姓李的副部长，传说因为对大中专毕业生的遭遇太富于同情心，分配工作中有“右倾”之嫌，被换掉了，实权掌握在一位“支左”的黄政委手中。这个黄政委，团头肉脸，模样有点像电影里的胡汉三，人也左得可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喜欢和毕业生中的女孩子厮混，口碑不怎么样，但却无可置疑地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喀什听到毕业生分配中许多怪事，比如学造船的分到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等等，多是属于专业不对口的；而在黄政委这里，除了专业不对口之外，还由于突出“阶级路线”，出了一些更加离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其中甘平的遭遇就很典型。甘平是北大地球物理专业66届本科毕业生，按说一个基层县分到这样的名牌大学生，应该让他好好发挥作用，至少要善待人家。不，只因甘家庭出身不好，先被分配到县粮油加工厂，本来已经屈才，却还怕他在这个“要害部门”投毒害人，扰乱社会，遂改分到地处县郊的农业气象站，仍不放心，不知道是不是怕他利用观测气象搞破坏活动，不到一年，农气站精兵简政，别人不简，独独裁了他。最后把他发配到县中学教数学，这才觉得比较妥当了。后来我们和甘平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发现甘其实是一个极正直、极诚恳的人。改革开放以后，他先是调到首府一所大学操起本行，并当了系主任，后来又远调南京，父亲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米夏公社一个生产小队简陋的农家土院里，我和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前前后后度过了两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我们中最远的来自鸭绿江边的丹东市；年纪

最长的年近三十，已做了父亲。我和妻子虽说新婚燕尔，却也得住集体宿舍，睡大炕，吃大锅饭，根本不敢奢想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一位军人从邻县来这里看望他怀孕的妻子，惊呼此地生活条件比当年的延安还要艰苦。三十年来，那个土院常常闯入我的梦中。我不会忘记那两位维吾尔房东，他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亲兄弟；不会忘记赶着毛驴去戈壁滩砍柴的经历。我用那段生活写了另一部中篇《桑园》。那一个个早出晚归和农民一起劳作的日子，吱吱呀呀从土路上辗过的高轮车，轰隆隆昼夜旋转不停的



1986年9月在叶城与果农交谈(左二是我)

水磨以及那把木柄磨得光滑可鉴、每天下地都离不开的砍土钎……还有三月的沙暴，五月的桑葚，八月的葡萄架，都溶进了我那段青春的年轮，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时候有文件规定，分配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可以免去农

村接受“再教育”。小惠已经分配到了县中，为避免夫妻在一起工作的诸多不便，我宁可下乡劳动也不愿到学校工作。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我的“再教育”结束的时候，黄政委向我宣布的分配单位仍然是学校，而且是一所初中戴帽的小学！

一个66届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生，已在学校完成了自己的全部学业，却被分配到小学去教书，这叫人太想不通了！黄政委软硬兼施，连哄带压，隔三岔五派人来催，告诉我，对他的决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是带着一种莫可奈何的惆怅去那所学校报到的。在那里，最多的时候我一人代三门课：语文、地理、图画，还要当班主任。地理没有课本，除了一本旧地图册，没有任何资料，每逢上课我就让学生逐省逐市的抄笔记。图画呢，我凭着自己的绘画知识随意讲，教学质量如何只有天知道。比教学工作更让人头痛的是学校的人际关系。你搞不清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过节，会上听不懂人家含沙射影明讽暗嘲的发言。你只觉活得很累，很烦，觉得这些人很无聊。

有一次，乌鲁木齐某大报一位摄影记者来学校采访，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什么座谈会上拍张新闻照片而已。我认出他是大学外系的一位同学。在学校我们从没有说过话，但面孔是熟悉的。我当时对他那份工作和他的地位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妒忌甚至敌意。我没有主动招呼他，也不希望他认出我来。事后，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哀。我不能这样下去！我没有低看教师这个职业的意思，我的妻子就是一名教师，但是我感到自己的位置不应该在这里。难道就这样混下去吗？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对我叹道：我知道，你心里太委屈了！

1972年，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活动催醒了埋

在我心中的文学种子。在县文化部门的组织下，我破门而出，先搞美术创作，接着转向文学，开始向心中的圣地发起冲击。地区报纸接二连三发表的几篇作品很快引起了县宣传文化部门的注意。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宣传部云部长——走到了我面前。他是由陕西参加西北土改工作队进入新疆的，在莎车也算得上资深干部了。云部长头大而浑圆，除了留寸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别的发式。他待人随和，喜欢思索，思维总是跳跃不定，叫人很难抓住其中的轨迹。我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但是他对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的关爱和支持却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在他主管宣传文化工作期间，莎车县产生了维吾尔第一部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维吾尔族的叙事文学的新发展；出现了在全疆有影响的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和表现维吾尔少数民族生活的新一代汉族作家，以及一批年轻诗人。有一届新疆文联主席和一届新疆文联常务副书记都是从莎车出来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们都铭记着云部长当初的帮助和关怀。外人称莎车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

云部长知道学校的作者最缺的是生活。他早就谋划着怎样给我们补上生活这一课。那年暑假，他亲自带着我们到农村采风。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连起码的牙具毛巾都不带，推着自行车就像去谁家串门似地带着我们上路了。我们在四公社一连住了几天。他替我们物色模特儿，安排我们的生活。那时我正为工作不理想而苦恼。他对此非常理解。起先他想把我调到县广播站搞采编，经过一段时间深思熟虑，他同我谈了一次话。我至今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

他先让我回答一个问题：是想把文学创作当作业余爱好，还

是当作一项事业？

我摸不清他的用意，一时不好作答。他说他观察我有些时间了，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假若只想小打小闹，他可以想办法调我到县广播站去，如果想真搞文学，他郑重地建议我到公社去工作。

这个建议让我觉得很突然。

“到广播站你会有些成绩，但难有大发展。”他具体地给我分析了在广播站工作的弊端，甚至包括在人事方面的不利因素，因为那是他管辖的单位，情况了然于胸。

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他的建议，我首先被他的真诚感动了。

“你眼光要放远些。”他推心置腹地说，“到公社去工作几年，对你今后文学创作受益无穷……”这个道理我懂，许多著名作家不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才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吗？可是下去也不那么简单，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倒也有些犯难了。

云部长要我回去好好想想，再跟爱人商量商量，不忙做出决定。

我当时三十出头，在我三十多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三次面临人生的关口。第一次是上大学时对专业的选择，因为考取的专业很不理想，我当时面临着还要不要上大学这样极其重要的抉择；第二次就是不久前在喀什分配时对命运的那番顽强抗争；第三次是现在，我要为一个遥远的、缥缈的理想告别妻女，自找苦吃，去过一种和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极大差异的另一种生活。我已经有两年多农村“再教育”的经历，不能说对维吾尔农村一无所知，正是因为知道，因为不再有天真浪漫，才更不好做这个决定。那